

黄鸣奋 著

英语世界



中国古典文学
之传播



I206.2

1158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

黄鸣奋 著

学林出版社

I206.2
H758



A0781148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

作 者 黄鸣奋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90,000
印 数 3,000
国际书号 ISBN7-80616-318-2/I·113
定 价 14.00 元

鸣 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厦门大学给予公派出国机会

●厦门华侨历史学会黄猷先生、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伊维德(W. L. Idema)教授对本项目予以关心帮助,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予以大力支持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褚真威、厦门大学历史系李明欢提供 Internet 及光盘检索资料,厦门大学中文系帅雯霖提供北京图书馆检索资料

●莱顿大学汉学院汉乐逸(L. L. Haft)博士、吴荣子馆长以及莱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唐承薇、袁冰凌、董李胜、郑甫红、褚真威、钟光清、陈宝卫、李玉宝等在笔者摔伤及胃出血期间多方关心照料,使本项目前期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特此致谢

HABT3/04

目 录

鸣谢

绪论	(1)
第一章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传播之背景	(17)
第一节 历史概况	(17)
第二节 地理布局	(28)
第三节 与其他语种世界的交流	(43)
第二章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综合研究	(48)
第一节 宏观研究	(48)
第二节 古代文论研究	(62)
第三节 民间文学研究	(76)
第四节 综论	(90)
第三章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散文之传播	(99)
第一节 概况	(99)
第二节 先秦散文之传播	(104)
第三节 汉朝至清散文之传播	(116)
第四章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诗歌之传播	(131)
第一节 概况	(131)
第二节 先秦至南北朝诗歌之传播	(143)
第三节 唐代诗歌之传播	(155)
第四节 五代至清朝诗歌之传播	(165)

第五章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小说之传播	(176)
第一节 概况.....	(176)
第二节 先秦至元朝小说之传播.....	(185)
第三节 明代小说之传播.....	(192)
第四节 清代小说之传播.....	(216)
第六章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戏剧之传播	(237)
第一节 概况.....	(237)
第二节 古代戏剧之传播.....	(244)
第三节 近代戏剧之传播.....	(257)
第七章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具书	(272)
附录 人名对照表	(279)

绪 论

文学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的重要交往手段。中国文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拥有不可胜计的瑰宝。它们不仅在本国众口皆碑,而且传播到日本、印度等亚洲邻国,从16世纪以来又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流传于欧、美、澳、非各大洲,引起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前中国文学在跨文化传播中流传最广的是以英语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即“英语世界”。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流传情况,不仅对全面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我国人民的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建设。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流传,是适应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历史现象。

从西方的角度看,近代从事中国文学译介的首先是一批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传教士们所选择的翻译对象以经籍为主。从今天的观点看,中国的经籍有些是文学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如《诗经》),有些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也和文学关系密切,如《论语》便是文学史家研究先秦散文时不能不瞩目的对象。因

此,传教士之译经无疑有助于中国文学之流传。当时身与其事的传教士比比皆是,著名的有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99年来华,意大利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1年来华,法国人)、郭纳爵(Ignatius de Costa,葡萄牙人,1634年来华)、柏应理(Phillippe Couplet,比利时人,1658年来华)、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意大利人,1659年来华)、卫方济(Frangois Noel,比利时人,1687年来华)、宋君荣(Antoine Ganbil,法国人,1721年来华)、蒋友仁(Michel Benoist,法国人,1744年来华)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人马若瑟(J. H. Marie de Bremaire,1698年来华)。他不仅节译过《尚书》和《诗经》,而且译出了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其译文被法国教士杜赫德(Du Halde)收入《中国通志》,随着《中国通志》的英译而为英语读者所知晓。英国传教士来华时间较晚,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的开山祖是马礼逊(Robert Marrison,1807年来华)。他和其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arrison,1814年生于澳门)都是著名的“中国通”,但所忙碌的主要是《圣经》翻译。对中国文学表现出某种兴趣的英国传教士可举出李提摩太(T. Richard,1870年来华)等。李提摩太所译的《天国行》是《西游记》最早的英译本。西方传教士译介中国经籍和文学作品的动机固然不止一端,但有两条看来是主要的,即向教会介绍中国国情(包括中国人的观念)和替在华传教寻找理论根据。出于前一种动机者多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辨析其异于西方宗教思想之处,例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在所译的《孔子学说系统分类》(1875)中便指摘了儒家不信上帝等24项缺点错误;出于后一种动机者则多从中国的意识形态里求同,比较典型的是法国耶稣会教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equet,1663—1740)。在他眼里,中国的高山均系耶稣殉难之处,四书五经都寓有基督教的涵意,中国文学里可发现与耶稣蒙难有关的十字架。当然,以上动机并非互相排斥,经常可以交相为用。

除译介中国经籍和文学作品之外,来华传教士还撰写了不少介绍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著作和文章,如葡萄牙人鲁德照(A. de Semedo, 1585—1658)著有《中国通史》(1645)、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 1609—1677)著有《中国的十二个显著特征》(英译本题为《中国新史》, 1688)等。这些著作和文章在欧洲既增强了人们对于遥远的中国的兴趣,又以其中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描述为人们学习汉语创造了条件。跟随传教士前往欧洲的旅英华人沈福宗(1680 年左右抵欧)等成为最初的汉语教师,师从沈福宗的托马斯·海德成为英国研究汉学的第一人。掌握(或初步掌握)了汉语的英国人有些成为外交官,有些来华经商,有些则在中国门户被打开之后担任了中国海关及香港等殖民地政府和机构的译员或官员,从上述人士中诞生了较早的一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比较著名的有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等。

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是近世西人来华的三种主要身分,这些身分彼此并非完全绝缘,并且由于西方人在华兴办学校、报纸等事业的缘故而可同新的身分或社会角色(如教师、记者、编辑等)结合。对中国民间传说颇有研究的德呢克(N. Belfield)即为一例。他于 1863 年来华,任驻天津领事,后来当了香港《德臣报》(The China Mail)社长兼主笔。“中国通”们回到欧洲之后,有不少人执教于高校,像英国领事官道格拉思爵士(R. K. Douglas)和翟理思(H. A. Giles)、殖民政府官员庄士敦(R. F. Johnston)、传教士苏慧廉(W. E. Soothill)和修中诚(E. R. Hughes)等就是如此。他们都对中国文学有兴趣,利用高校所提供的条件继续推进自己的科研,并逐渐形成了基于师生关系的学术群体。这些汉学家的子女由于家庭的陶染而每每熟悉并爱好中国文学,像翟理思之子翟林奈(L. Giles, 1875—1958)就是如此。他随父亲返英国后当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翻译了《诗经》、《三国演义》、《搜神记》等作品。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里的传播与近代海外

移民有密切关系。

华人移居欧洲的最早时间难以确考,但至迟 17 世纪便有华人到了英国(见前述)。1785 年,多名中国海员在巴尔的摩港定居,由此开始了华人移居美国的历史。1788 年,50 名中国工匠抵达加拿大维多利亚,又为华人移居美洲添上了新的一页。进入 19 世纪以后,由于“淘金热”的影响,前往美、澳、加、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华工数量剧增。很难判定当时异域谋生的这些华人的文化水平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但若推测他们至少懂得一些中国民间传说和歌谣,应当是合情合理的。也很难判定他们对英语的掌握程度以及有否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明确意图,但若假定他们多少学会了一点英语、在和来自其他国家劳工共同劳作和娱乐的过程中产生过讲唱家乡传说和歌谣的某种愿望,大概同样是情理中事。那些通常英语水准较高、和当地人士交往较多的会馆首领更有可能在传播中国文学方面有所作为。对此,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还要谈到。

劳务移民只是近代华人海外移民的一种形式。从 19 世纪以来,留学在海外移民中日益成为重要因素。中国人到英语国家求学,最初以攻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逐渐有人选择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大约从本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成批出现由留学生撰写的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的英语博士论文。可以肯定相当多的留学生只是把中国古典文学当成自己的“敲门砖”、一拿到学位便改行了,因此我们除了其博士论文之外见不到他们撰写的别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更不用说著作了。当然,也有的留学生从其他专业转到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来,将它作为自己的工余爱好甚至职业。无论留学生们如何在学术领域进行跨专业流动,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充当了本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生力军。作为例证,可以举出洪煊莲、施友忠、张心沧、李祈、李田意、丁乃通、夏志清、罗郁正、刘若愚、王靖献、马幼垣、时钟

雯等一大批知名学者。这些人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内获得学士学位后出国深造的,毕业后留在英、美任教并从事与中国古典文学有关的研究。也有人回国(或曾回国)工作,成为专业或业余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如蔡廷干、林文庆、陆志韦、王德箴等,其中在英语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大概要推翻译家杨宪益了。

当今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地理分布和华人的聚居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就海外而言,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西雅图、圣地亚哥,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澳大利亚的悉尼、坎培拉等城市和地区。既是华人海外移民的集中点,同时也是所在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地。位于这些地方的各高等院校所招收的学生中,华人或华裔占相当比例,这些学生选择中国古典文学为研究方向的不乏其人,新的专家学者正源源不断地诞生于其间。仅在1994年,由中国留学生或华裔学生完成的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的英语博士论文就有 Xiaoshan Yang《感知和再现:中英自然想象诗学的比较研究》、Xiao-ai Chang《中西艺术理论和实践里术语的艺术范畴的跨文化阐释——一种符号学分析》、Xiao-long Qiu《中国古代文学里的爱:相对于儒家伦理的净化激情》、Ji-hui Wang《盎格罗-撒克逊文学和中国文学里的王权观念》、Enhua E. Peng《中国古代诗歌里引喻的作用》、Jian-hsin Wu《明清家庭小说中的著名人物》、Guangren Grant Shen《明代的戏剧演出》、Chengyu Xiong《京剧出现之前中国传统戏剧里行当的起源与发展》、Qitao Guo《徽州目连戏:以神鬼传达儒家道德观》、Fang Dai《饮酒,思考与写作:阮籍和其时代的文化》、Nanxiu Qian 以《是你自己:〈世说新语〉里的叙事艺术和人性分类学》、Pi-ching Hsu《庆祝情感自我:冯梦龙与晚明伦理学、美学》等多篇。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发祥地的本土将英语当成外国语来教学,是近代传教士来华以后的事情,像罗郁正、时钟雯当年就读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就是教会背景的学校。其他类型的学校通过聘请外籍

教师或回国留学人员任教的方式开展英语教学,培养出一批批能应用英语从事科研和社会活动的人才,从而为本国的古典文学翻译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从政府方面看,清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中西文化交流持消极态度,谈不上什么“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之类雄心大志。当时已出现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出版活动基本上都是民间的。民国时期对“国故”倒是相当重视,也成立了国立编译馆之类机构,但重视“国故”不等于重视古典文学,加上其时战乱频仍等原因,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出版事业仍然很萧条。这种局面直到新中国诞生后才根本改观。新中国大力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将译介本国古典文学当成大事来抓,从而造就了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这样国际知名的翻译出版机构。近年来,台湾当局曾宣传说要台湾建成世界汉学研究基地,也利用蒋经国基金来吸引和资助外国人从事汉学研究,但这项计划对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是个有待考察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作为英语发源地的英国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发源地的中国的情况,顺便谈及美、澳、新、加等主要英语国家的相关事件。应当指出:中国以外的非英语国家的学者们亦常采用英语写作,像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 Prusek)和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 L. Idema, 1944—)就是如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亦属于本书的考察范围。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是相应作品流传的结果,同时又对作品的鉴赏发挥着指导作用。原始意义上的作品流传是指相应载体被输送到诞生地以外的场所(例如《全唐诗》为大英博物馆或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或者被作者以外的其他人所借阅,这是文学传播的起点。如果接触过作品的人发表了自己对它的看法,这就成了文学批评。狭义的文学批评是指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分析和评论,广义的文学批评则可能采取多种价值尺度。笔者曾在《需

要理论与艺术批评》一书(1993)中辨析了 18 种价值尺度,其中较常被人们所运用的有哲学尺度、政治尺度、宗教尺度、史学尺度、文化尺度等。如果接触过作品的人所发表的看法采用的是与原作不同的语言,这种批评便是作品的跨文化批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就属于此类。当然,在更广的意义上,即使批评者并未采用与原作不同的语言,只要他本身隶属于与创作者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因而所拥有的价值观和美学趣味迥异于原作者,所进行的批评也可以称为文学的跨文化批评,像海外华人用汉语对故土文学的评论和来华外籍人士用汉语赏析中国作品便是如此。不过,本书并不打算就这一意义探讨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其一为译注。译注者对原作的批评或见于序跋、注释,或见于对原作的增删、遴选、铨次、变形,我们不妨说前者是有形的批评,后者是无形的批评。像埃杰顿(C. Egerton)英译《金瓶梅》(1954),有些段落故意采用拉丁文,这里的良苦用心即使不加专门阐述读者也体会得到,显然译者认为那些段落的描写太不雅了;韦利(A. Waley)译《诗经》时割弃了变雅,则是由于不喜欢政治讽刺诗的缘故。这些都是无形批评的例证。当然,许多译注者都通过前言、后记之类途径表明自己在翻译时的种种考虑。可见,有形的批评和无形的批评经常相互补充。相比之下,有形的批评所表露的观点更明确、更富于逻辑性,也更值得重视。有些重要的序跋已被汉译,如施友忠英译本《文心雕龙》序言(见《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曦钟译)等。至于英译文本身或韵或散、译者喜欢“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即自由发挥或恪守原文),则体现了英译者的翻译观和个性特色,倒不一定是针对原作的批评,因此本书不将它们作为重点。

其二为赏析。如果说译注主要帮助读者理解原作大意的话,赏析则要求进一步指出原作的妙处或瑕疵,这就不是一般地诠释名物典故、介绍作家生平、勾勒时代背景、解说文体特征所能办到的,

必须根据一定的美学标准将上述几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有时还须援引其他作品以资比较。赏析本身又可依其基点而分为作品赏析、文体赏析、主题赏析、作家赏析等类型。作品赏析是以一篇篇原作为单位进行的,如林文庆的译本《屈原〈离骚〉:罹哀之挽歌》(1929)等;文体赏析是将属于同一体裁的作品结合起来进行鉴赏,如毕肖夫(F. A. Bischoff)的《释赋》(1976);主题赏析的特点在于宣讲同一主题的若干作品,如傅汉思(H. H. Frankel)的《中国诗选译随谈》(即《梅花与宫女》,1976);作家赏析则是选取其代表作若干篇以分析其风格特征,如赵婉贞的《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的生平与作品》(1968)。

其三为专论,即针对某一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或史实考证。如果说译注面向一般读者、赏析面向文学爱好者的话,专论则面向文学研究者,要求有新意和一定的深度,对常识性的介绍往往从略。专论的范围有狭有宽,狭可狭到一首诗中的一个问题,宽可宽到一个时代、一种文体、一种思潮或流派。论题较窄的如哈特曼(C. M. Hartman)《韩愈诗中的语言与用典:〈秋怀〉》(1975)、E. Shan Chou《杜甫〈八哀〉诗中的用典与想象》(1984)等;论题较宽的有刘若愚《中国游侠》(1967)、宇文所安(S. Owen)《追忆:中国古典文学里对过去的体验》(1986)等。

其四为综述,亦即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综合评论,具有为一般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提供参考读物、为文学研究者提供学术动态等多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面向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因为它带有总结性、是“批评的批评”,像佩裴(J. D. Paper)《中国散文导读》和贝里(R. B. Bailey)的《中国诗歌与戏剧导读》(均为1973年出版,1984年增补)就是如此。海陶玮(J. R. Hightower)的《中国文学论题:概览与书目》(1950)亦属于综述,但全书自成体系,又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成果具体体现为论文和书籍,

介于二者之间的有博士论文和作为非正式出版物的论文单行本等。为了解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规模,对上述成果进行定量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当然,这样做的困难很大,一是资料收集极为不易,二是统计对象的外延经常模糊不清(原因在于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难以划定)。鉴于上述情况,目前所能做的定量分析只能是非常粗略的。笔者为此曾逐一查考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相关藏书,通过国际计算机网络检索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并参考了工具书及光盘资料。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全球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的博士论文、论文单行本和正式出版物有2000余种(其中博士论文占近1/3)。英语报刊译、论文总数应当远过于此。两项总数相加,估计从16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至少有5000余项。必须说明是:这个统计数字不考虑报刊论文和出版物重复的可能性(报刊论文即使被收入论文集正式出版,仍单独算一项),也不考虑博士论文和出版物重复的可能性(博士论文即使已经正式出版,仍单独计算)。对同一种书籍的多种版本,原则上以标题为准,标题相同的合计(只算一项),标题不同的分计。

从整体上看,处于两种文化交会区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具备如下特点:其一,常以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参照系。例如,吉布斯(D. A. Gibbs)《〈文心雕龙〉里的文学理论》(1970)和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975)便都借鉴了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1953)当中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他如美国学者帕利和其学生关于口头创作中时常运用套语与套式的理论被王靖宇引以分析《诗经》、确定成诗之先后并进行训诂,语言学家雅克布森所提出的语言结构选择模式的对等原理被高友工、梅祖麟用来分析唐诗,瑞士心理学家容格所首倡的原型批评理论被蒲安迪(A. H. Plaks)援引以探索《红楼梦》的奥秘,等等。其二,广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单单诗歌类以之为题的就有《华兹华斯与陶潜》

(Ping—Chow Tu, 1959)、《李贺与济慈》(D. Ying Chen, 1962)、《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王维的山水诗》(陆润棠, 1976)、《诗中玄学: 韩愈与但恩比较研究》(S. Chung—Sang Suen, 1978)、《司马相如的赋与李利的优俳体》(罗青哲, 1980)、《诗心的主客观性: 叶芝与叶甫诗作比较》(An—yan, Tang Fang, 1981)、《叶芝所界定的现代诗: 与杜甫之对比》(Susan Suk—ning So, 1982)、《景的涵意: 中英诗歌里作为情感表现的风景描写》(孙筑瑾, 1982)、《隐喻与转喻: 中西比较诗学》(M. Mi—hsi Yeh, 1982)、《苏东坡与华兹华斯诗歌比较研究》(Dong—sheng V. Yang, 1985)、《杜甫、叶芝诗歌比较》(Chuan—Cheng Wu, 1989)、《情形于外: 从比较的角度看陶潜诗学》(Mong Meng, 1990)、《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里自然想象的艺术运用》(Zuoya Cao, 1993)等多篇, 虽不以之为题, 但在行文中进行中西文学比较的更是俯拾皆是。具体的做法有从中国角度看西方作品、从西方角度看中国作品, 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类型研究等, 不一而足。其三, 经常用西方“表现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之类术语标定中国古代作家, 如 Eng—Chew Cheang《作为批评家的李贽: 明代观念史之一章》(1973)着力剖析李贽作为“反传统主义者”的特征, 倪豪士(W. H. Nienhauser)《皮日休》(1979)将其文论归结为“实用主义”等。平心而论, 上述“标定”的做法有时因忽视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显得不够妥当, 某些译作和论著中的译法和提法也大可商榷, 但是,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整体上看是硕果累累的。它们既为我们提供了本民族文学跨文化传播的实例, 有助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又可开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思路、扩大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治学视野。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批评在本文化圈所发挥的功能可以归结为对受众的指导、对创作者的启迪和对读者、观众、出版者的引导等方面。一般地说, 文学批评为读者和听众提供了理解和评价作品的

指南,不仅影响到作品的传播范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公众对它的态度。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英语世界。本世纪30年代初梅兰芳赴美演出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了他本人的高超技艺之外,文学批评本身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来华外籍人士通过各种英语书刊所作的介绍,梅兰芳的名声早就传到太平洋彼岸;他出访之前,梁社乾、刘天华、齐如山等人协助整理和编纂了相关剧目的英文资料;梅氏在美首场演出取得成功之后,美国报刊及时作了报道并给予热情的赞扬,这些都是造成万人空巷争睹梅氏风采、中国京剧轰动美国的原因。上述例子说的是古典戏剧的演出,古典诗歌、散文和小说的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本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寒山热”,就和韦利(A. Waley)、斯奈德(G. Snyder)和沃森(B. Watson)等人对寒山诗歌的译介和推崇密切相关。文学批评不仅影响一般的接受者,而且影响于文学家、艺术家,因为它总结了别人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展现了广阔的艺术天地而可以成为借鉴。这方面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美国人费诺罗萨(E. F. Fenollosa, 1853—1908)所撰写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他的手稿给了美国诗人庞德(E. Pound, 1885—1973)那么强烈的震撼,以致庞德萌发了不可抑遏的翻译与摹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强烈热情,这种热情进而感染了美国的其他意象派诗人,成为中国古诗渗透到美国文学的重要契机。介于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出版商同样受文学批评的影响,因为文学批评是他们发现有潜力的作者和预测市场行情的根据之一。英国汉学家韦利成名之前,要出版文集何其艰难。1917年11月15日出版的《文学拾遗》(Literature Supplement)杂志所刊登的一篇书评使他的命运从此吉星高照,这篇书评称赞他所译古诗是“新的卫星”,伦敦康斯特布尔出版公司(Constable and Company)由此拍板刊行韦利的《汉诗170首》(1918),韦利的译作此后为伦敦的艾伦和昂温(Allen and Unwin Company)、本(E. Benn),纽约的诺夫(A. A. Knopf)、约翰·戴(John Day)和麦